



刘文鹏 / 著

盛世背后

乾隆时代的伪稿案研究

SHEUSHI BEIHOU QIANLONG SHIDAI DE WEIGAOAN YANJIU



人民出版社

盛世背后

乾隆时代的伪稿案研究

SHENGSHI BEIHOU QIANLONG SHIDAI DE WEIGAOAN YANJIU

刘文鹏 / 著



人民
出版
社

责任编辑:冯 瑶 陈鹏鸣

封面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背后:乾隆时代的伪稿案研究/刘文鹏 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

ISBN 978-7-01-013499-4

I. ①盛… II. ①刘… III. ①文字狱-中国-清代 IV. ①K249.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6305号



盛世背后:乾隆时代的伪稿案研究

SHENGSHI BEIHOU QIANLONG SHIDAI DE WEIGAOAN YANJIU

刘文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1/16 印张:19.25

字数:280千字

ISBN 978-7-01-013499-4 定价:4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伪稿案”，即“伪孙嘉淦奏稿案”，是清朝追查冒用当时朝廷名臣孙嘉淦的名义，伪造奏稿，批评皇帝的政治案件。它爆发于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然后犹如一场政治运动，横扫全国。到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才得以结案，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轰动，在清代比较罕见。

具体而言，伪稿案有三个特点：首先，假冒孙嘉淦的奏稿流传由来已久，它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社会上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内容也不断在变化。先是借孙嘉淦之名批评朝中权要，主要针对鄂尔泰、张廷玉等大臣，乾隆十五年以后，把批评即将到来的南巡、张广泗被冤杀的内容加入，甚至还伪冒乾隆的朱批，其内容已经直接指向乾隆帝本人的诸多施政措施。所以，伪稿是一个成于众手、传于众口的传说；其次，传播时间长；再次，传抄、传播人员大都是下级官员和普通百姓。^①而且，在伪稿案的追查过程中，乾隆帝的态度一直非常强硬，督促各地督抚严厉办案，并处理了一批办案不力的官员。同时，它也让乾

^① 参见陈东林、徐怀宝：《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考述》，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第3—10页。

隆帝深刻感受到民间所蕴藏的对朝廷统治极为不满的思想，并以严厉手段对付伪稿传播者。所以，伪稿案也被认为是继乾隆十三年丧后风波之后，乾隆时期政治统治由宽转严的标志之一。^①

然而，对这样一个朝廷追查近两年、蔓延全国、尽人皆知的大案，研究者寥寥，成果稀疏，唯陈东林、徐怀宝合著一文引人注目，很多著述中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将其当作一个文字狱，借以批判清朝统治者文网之严密。除此之外，尚无更多言语揭示这个案件的真实面貌。可仅仅将其解释为一个文字狱或朝廷政策的表现，还不足以展示它深刻的政治意义及与社会的影响。这个案件本身所透露出来的很多信息还值得再作深入分析：

如，伪稿这样一个政治传言为何能够地在全国范围内、跨省区地风靡一时？是如何传的四海皆知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在热衷于伪稿的传播？

再如，乾隆皇帝严查伪稿的思想动机是什么？是一时之怒，还是有深层内涵？为什么这位盛世天子如此高调追查，又草草收场？

又如，朝廷及地方督抚是如何动员其政治力量、行政力量进行追查？为什么清朝全国总动员的强大政治力量追查伪稿传播既轰轰烈烈，又无可奈何、无果而终？

有几个条件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这些问题：

一是伪稿案档案的充分发现和发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于1998年在《历史档案》上用4期的篇幅，公布了两百多件伪稿案奏折，这些档案为笔者提供了初步的材料支撑。后来又在一档馆和清史工程的数据库中查找，竟然又发现很多件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剔除内容重复者，竟然还有三百余件，加上《历史档案》已经公布的，仅档案一项就有五百多件。再去乾隆十六年到十八年的《清实录》中搜集，与伪稿案有关的内容也竟然连篇累牍，有十五六万字之多。可以想象：在追查伪

^① 参见戴逸：《繁露集》，第36页。

稿案的19个月中，皇帝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有关奏折，每天都会与军机大臣讨论这个案件，几乎每天都要发出相关上谕。这让我们感到这个案件震撼程度，也加剧了对那些问题的“好奇心”，到底是什么让盛世之君乾隆帝如此怒不可遏？又是什么让强大的行政机器似乎陷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追查之中却收效甚微？那两名被皇帝凌迟处死的人是“真凶”，还是遮掩皇帝颜面的替罪羊？

二是伪稿案是对政治信息传播进行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伪稿被当作邸报传遍各省，它让我们看到了古代社会政治信息的传播网络和传播特点。在一个较为发达的商业社会，无论是地方士绅，还是举人秀才，或是长短途贩卖货物的商人，都对中央或各省的政治信息有着较为旺盛需求，由此造就政治信息的市场。来自中央的邸报、各省的辕门抄等，都被不断加工成各种小报，进入商业操作的流程，成为可以带来商业利益的商品。伪稿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中下级官员、报人、士绅、商人等构成信息流播的各个环节，特别是远程贸易的商人，通过长途贩运，将货物带到远方的同时，也将信息带到各地，而各地的商行犹如一个信息交流、集散中心，从而逐渐编织成一个巨大的信息网络。伪稿一旦进入其中，便传遍大街小巷。

三是伪稿在当时的泛滥与消失，让我们看到古代商业社会中民间舆论兴衰的一个案例。我们似乎应该跳出仅仅从强化政治统治来看这个案子的视角，实际上，民众有时也可以被看作这个案件的主角，档案中的大量口供，表明他们“创造”或制造了这种信息，并把这个信息传播到天涯海角。“五不解十大过”在两三年的时间中曾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街谈巷议，而每个传播者似乎在通过传播或者改造“伪稿”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由此，伪稿传播的意义已经超越真伪，它成为一种舆论，表达民众对政府的态度，反作用于高层政治。所以，运用传播学、舆论学的理论探讨伪稿案，也是笔者的一种尝试。

四是在巨大的专制政治压力下，民众如何应对？长达一年半之久的伪稿追查，犹如一场白色恐怖笼罩了民间，每个省的督抚等官员都希望

能够找出始作俑者，甚至不惜“制造出”一个个始作俑者，来应对皇帝的追问。由于压力来自最高层，无论是谁，只要涉及任何一点伪稿线索，就会被抓捕、审讯、严刑拷打。人们真的需要以“道路以目”来躲避官府歇斯底里的追查，或者避开周围存心不良者的陷害。然而，在恐慌的另一面，人们也在以不同的方式与官府周旋，串供、翻供、逃跑、制造“死亡”等，手段花样百出。这些都构成弱者的武器的一部分，让看似强大的官府疲于应付。冤狱、怨恨就这样在一个所谓的盛世之下，悄无声息地慢慢积累。

虽然伪稿案的很多档案也已被销毁，然而现存的材料足以让我们看到皇帝的心态、政府的运作、政治信息的传播以及高压政治下的民众心态，还有什么样的案例能够以如此丰富的资料，完整地展现一个历史事件如此多样化的内涵呢？

总之，笔者希望通过细细梳理皇帝的上谕、大臣的奏折，特别是档案中的口供，以图构建一个伪稿追查的全过程，同时可以捕捉皇帝、大臣、民众在这场政治运动式的案件追查中的心态，然后对那个阶段的历史做一个反思：

辉煌的乾隆时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盛世？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五不解十大过”	1
一、“五不解十大过”	2
二、孙嘉淦与伪稿的产生	15
三、乾隆皇帝与他的“盛世”	20
四、奏折常规化与政治信息控制危机	25
五、房鋈拦驾叩阍	34
第二章 案 发	39
一、皇帝的密谕	39
二、畿辅地区与山西的清查	51
三、东线的追查与伪稿案的升级	60
四、西线的搜捕与一条正线的浮现	80
第三章 权力、邸报和信息控制	90
一、伪稿与邸报	90
二、邸报的传递网络	98

三、邸报、谣言与政治斗争	118
第四章 追 查	130
一、从边缘指向中心	130
二、在湖南重灾区的密集追踪	150
三、江浙之间的纠结：吴进义—陈公绶案	170
四、江西的正线：指向施氏一门	189
五、强大的督抚力量	194
第五章 传 播	198
一、商业社会中的信息传播	199
二、邸报信息的商品化	205
三、还原伪稿在民间商业网络中的传播	213
四、伪稿传播与公众舆论	229
第六章 结 案	233
一、尹继善的失败	233
二、鄂容安来到江西	246
三、何以如此结案	275
结语 盛世的背后	289
参考文献	293
后 记	296

第一章 “五不解十大过”

每一种矛盾都既是价值的冲突，也是利益的冲突；每一种“需求”在它成为“应然”的过程中，都含有感情和“要求”；每一种阶级斗争同时也是关于价值观的斗争。

——E.P.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

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初，刚刚结束了木兰秋狝围猎活动的乾隆皇帝，带着太后、百官回到热河避暑山庄。炎炎夏日，那里却能享受到从山中湖面吹来的丝丝凉意。

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时期，那时的热河一带环境优美，水草丰茂，为了便于在热河以北的围场举行木兰秋狝，圣祖玄烨依山水形势，凿山围水，逐步修建宫殿与亭台楼榭，康熙时曾建成三十六景，乾隆时又扩建三十六景，共七十二处景观，形成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其间的宫殿楼阁，形制简约，茅茨不剪，完全没有北京紫禁城的壮丽辉煌。可整个园子之内，景观林立，精雕细琢，仍不失皇家气派。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几乎年年来此居住四五个月的时间，他们都要在避暑山庄北部的围场一带举行大规模狩猎活动，以此训练八旗军队。同时，这里也是大清皇帝会见蒙藏各部首领、接受其觐见的地方。为此清朝在避暑山庄的东部、北部修建了金碧辉煌的外八庙，供蒙藏政教首领居住。这些风格

各异的建筑，不但显示天子对他们的特殊恩宠，而且表现出各民族的风俗与强烈的宗教色彩。所以，避暑山庄一带的围猎和宗教活动，提供了朝廷与边疆地区各部族之间交流的机会，相对于北京，他们在这里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非常有助于皇帝获得他们的认同，维护大清一统。由是，在万马嘶鸣之后，觥筹交错之际，各部归附，塞外又安。

然而，八月初的这一天，一封来自万里之外昆明的奏报，让避暑山庄内那种惬意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那个奏折中，云贵总督硕色称发现一张到处流传的邸报，邸报所录奏折以“五不解十大过”为名，谤讪皇帝，指斥朝政，而署名人竟是当朝名臣、工部尚书孙嘉淦。硕色还将这张邸报原件附在奏折后面呈选御览。^①乾隆帝看完，一下子火冒三丈。奏稿中对乾隆继位以来的诸多政事逐一批评，涉及南巡、皇后之丧、张广泗之死等，都是震动一时的大事，乾隆执正以来，甚至自清朝立国以来，如此逆批龙鳞还属首次。他相信忠诚的孙嘉淦不会这样写，一定是有人假冒这位刚正不阿的谏臣的名义，伪造奏稿，攻击皇帝和朝廷，其背后肯定有一种包藏悖逆之心的巨大阴谋。在与军机大臣讨论一番后，八月初五，乾隆皇帝签发了一份密谕，立刻交付东华门外驻扎等候的兵部差官，通过驿站迅速驰递各省。一场查办伪冒奏稿的大案就此拉开序幕。

一纸伪稿何以让乾隆皇帝如此震撼？到底是什么激怒了皇帝，让这位盛世天子以雷霆之势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

一、“五不解十大过”

伪稿的内容在当时被概括为“五不解十大过”，这个概念经常用到

^① 《云贵总督硕色为报提塘吴士周禀内伪稿事奏折》，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历史档案》1998年第3期。

办案的各省督抚奏折中，然而就目前发现的档案来看，当时广泛传播的遍地伪稿竟没有片纸存留，其内容已经难以追寻。能够解释这种状况的最大可能性就是伪稿被彻底销毁了。正如山东巡抚鄂容安在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的一份奏折中称：“应尽灭伪稿，不使闻阁遗留片纸，庶邪说得熄，并可免好事之辈将来复肆谤张。”^①

清朝亦有“悖逆之言不入奏折”的规定，处理伪稿的奏折、上谕等档案虽然保留下来数百件之多，但在当时没有哪个督抚敢在奏折中抄录伪稿内容，甚至在留下来的诸多审讯口供中，也都尽量回避了。如此，那流行一时的伪稿看来已经被销毁得干干净净，以至于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洞悉“五不解十大过”的真实内容。

案件规模如此之大，原稿销毁又如此彻底，我们完全有理由赞叹乾隆治下大清王朝的行政效率。可赞叹之余，似乎也可以从档案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持续一年多肃杀、恐怖的政治气氛。在皇帝的高压之下，上千人被抓，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只要与伪稿嫌犯沾边，都意味着一种灾难，被捕、抄家、严刑拷打、鞭笞杖责、身陷囹圄，甚至是掉脑袋。所有人都将手里的伪稿付之一炬，没人敢存、敢留，甚至在茶余饭后绝不敢把伪稿当作谈资。官员则将查获到的伪稿悉数上缴，最后汇总到京城的军机处。人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伪稿。

但越是如此，越是激发我们对伪稿内容的好奇心。如今尽管伪稿原件无存，好在我们还能从实录、奏折及审讯口供中找到伪稿内容的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如同要穿越到过去去侦破一个遥远的谜案，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线索，对“五不解十大过”进行一下想象和重构，也由此而想象一下那个所谓强盛的时代。

^① 《山东巡抚鄂容安为参劾失察知县并拿获存有伪稿生员陈浩事奏折》，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六，见《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四）》，《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以下所引自《历史档案》的奏折均为《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不再注明，其中（一）至（四）载于《历史档案》1998年第1—4期，（五）至（八）载于《历史档案》1999年第1—4期。

在档案中发现的线索

虽然没有发现“五不解十大过”的任何原文，但有些审讯口供中还是留下了只言片语。

江苏巡抚庄有恭（后曾署任两江总督）于乾隆十八年正月初十日的奏折中，附有嫌犯陈公绶等人的口供，约略提到所谓“五不解十大过”包括乾隆皇帝南巡、孝贤皇后大事剃头、大金川不该用兵、张广泗之事等事。如：附件二，钱玉珍供折

据供：“陈公绶供小的的稿是诬扳小的的，小的没有犯过伪稿案，侄子钱坤曾经犯过案的。小的曾于三四月里在王昌言家看过稿，但并没有抄，他父亲王二可也在旁看见，他已经身故了。”

又供：“小的实在没有抄写的，小的是宿迁右营守备的书办。五月十一日，小的在孟宗那里问他，他告诉小的，小的五月十九日到苏州陈公绶家，陈公绶问小的有什么新闻，小的说是有孙大人谈皇上的本章，内中有皇上南巡、孝贤皇后大事剃头的事。”

据沈翼天供：“当日稿子，革生是看过的，约二三百字，字是细小的，当中是不解语句条款，记不起了。稿是竹纸写的，面上没有字的。”

又供：“稿子没有细看，故此记不得了，大概不过是皇上南巡、大金川不该用兵这些事，余外记不起了。”

又供：“那边革生不过一瞧就撩开了，没有细看，故此记不起了。大概说的是不过孙大人奏的皇上不解的事情，那条款有六七条。”

又供：“稿上是不解的话，有五条，余外不敢说。”

又供：“条款是十款，一款是张广泗事情，一款是打死老公的事，还有五不解的话。”^①

在湖南巡抚范时绶的追查中，发现有人还在伪稿上添加皇帝的批

^① 《江苏巡抚庄有恭等为审理陈公绶等传送伪稿事奏折》，乾隆十八年正月初十日，《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

语：“著孙嘉淦随驾南巡，有不是礼处，著再具奏。”

结合以上在档案中提到的几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五不解十大过”都是直接批评皇帝施政措施的，这也是让皇帝盛怒之下大动干戈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符合什么条件的事情可列入“五不解十大过”？

(1) “五不解十大过”应该是发生在朝堂之上的大事，皇帝是事件的决策者，事情的结果也必须体现皇帝个人意志，而且让百姓感觉到不仁道、不正义；

(2) 这些事情中不少是对百姓利益造成了损害，一度使民间怨声载道；

(3) 大部分事情应该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百姓所熟知，而不是在朝廷秘密发生的事情；

(4) 可以表现皇帝决策失误、引起争议的事情。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五不解十大过”的一部分内容：

1. 皇帝南巡：劳民伤财、差务繁重

以上残留的档案口供中提到最多的是乾隆南巡问题，南巡不仅是“五不解十大过”中的主要内容，而且是引发伪稿案最直接的导火索。

自乾隆十六年（1651）始，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止，乾隆仿效祖父康熙，六次南巡江浙，声势浩大。他自己把南巡视为与平定西北战争同样重要意义的大事，但晚年他也承认历次南巡开支浩繁，奢华无度，有害无益。^①

后世学术界也一直把南巡当作研究乾隆时代的标志性事件，非常关注，如何评价也颇具争议。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乾隆南巡在巩固统

^① 《清史稿校注》卷三百六十四，《吴熊光传》载：“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载：“皇帝去岁南巡，供亿浩繁，州县凋敝，农民举未省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收，无异歉荒。至于蚕桑，亦失其时。绸缎之属，天下专靠于南边，而今年则燕京人衣裳之资，鞋袜之属，绝贵于常年。”

一、笼络汉人、治河修海塘、加强武备等各方面作用突出，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繁荣文化和经济，甚至连中国的园林艺术也因为乾隆的雅好迅速发展。比较新的观点认为清代皇帝出巡具有强烈的满洲人传统，相对于明朝皇帝晏处深宫、不理朝政，满洲皇帝把出巡解释为“勤政”、“爱民”的表现。南巡之前，乾隆帝已经于乾隆十三年（1748）初东巡泰山，祭祀孔庙；十五年又西巡五台山，至太原；然后巡视中州河南，至洛阳、开封而返。南巡是这些巡视活动的继续，是满洲统治者的向江南的汉人社会展示武备、家法和纪律性的方式，对清帝国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批评者则认为，乾隆南巡名义上治河、修海塘，但多半为游玩享乐，劳民伤财，败坏吏治民风，给百姓造成沉重负担。在与康熙相比，乾隆南巡更显得挥霍无度却功效甚微。康熙南巡屡屡视察河工，终保得黄河在几十年内安全无恙，而乾隆治河花费不下数百万，但黄河泛滥愈发严重。甚至可以认为，乾隆的南巡成为清朝盛衰转变之机。^①

对于自己的出巡，乾隆皇帝总是喜欢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不扰民，不许地方督抚多费帑银……他甚至认为南巡的花销大多来自于盐商的报效而不是出自国库。而且几次南巡中，皇帝还屡屡蠲免所到之处的赋税，每次皇帝都能够得到官员报告说：百姓为此欢呼雀跃。

但实际上，乾隆十四年，皇帝发出准备于十六年南巡江浙的上谕后，沿途各省官员为取悦皇帝，修建大量行宫、园林，扩建道路。为此不惜拆毁民房、强占民田，又巧立名目增加科敛。而且由于时间紧迫，各级官员催迫甚急。据时人记载，自乾隆十三年末黄廷桂总督两江，其为政风格颇为江南士民所不满，至办南巡大差，督责严刻操切，更使民

① 以上论述参见左步青《乾隆南巡》（《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陈捷先《乾隆南巡略论》（《明清史》，1990年版，第274页）。较为全面的陈述乾隆六次南巡在各方面的得失。王学泰《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从古代帝王巡游说到乾隆南巡“盛典”之玷》（《紫禁城》2006年第2期），霍玉敏《康熙、乾隆南巡异同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徐凯、商全《乾隆南巡与治河》（《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朱宗宙《乾隆南巡与扬州》（《扬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情汹汹。^①黄廷桂严催督急，州县奉行不善，科派地方绅富各人承办，人心惶惶。“苏州尚有称为黄老虎者”，^②刑部员外郎蒋楫，家住苏州，“乃独力捐办（苏州地方）御蹕临幸大路，计费白金三十余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③

当时御史钱琦风闻其事，遂具折参劾黄廷桂，称黄廷桂在南巡向导所过地方，预先授意州县，令铺设备极华靡，器用备极精致，多者用至千余金，少者亦五六百金，且有随从员役，任意勒索。钱琦还称此事虽属风闻，但外省积习相沿，事所或有。钱琦在奏折中也参劾直隶总督方观承组织人力大规模修缮御道，“劳民妨农，办理地方，不甚妥协”。

但乾隆帝在上谕中颇为黄廷桂、方观承辩护，他说方观承是在按照每年修理道路的既定程序修路，是为了方便商旅、官员，不仅是为了南巡。对于钱琦所奏黄廷桂的情况是否属实，乾隆帝命将钱琦奏折交江苏巡抚雅尔哈善调查。雅尔哈善是黄廷桂的下级，他很快回奏称：总督黄廷桂曾札令各属伺候向导供应，而向导舟行迅速，未进公馆，从未接受州县酒席、馈赠。他说也质讯了千总白凯，并无索诈银两之事。乾隆帝看了雅尔哈善的奏报，没有表示肯定或否定，反而斥责雅尔哈善词意多属含糊迁就，心持两端，命再详查具奏。

但此时乾隆不是让雅尔哈善再查黄廷桂到底有没有违规之处，而是查御史钱琦奏报是否失实。“钱琦所奏藉势挟诈之事，其为风闻失实，已属显然。”^④

一个月后，钱琦被调任巡台御史，而且皇帝令他即刻赴任，不许停留。“著大学士来保传谕钱琦，台郡远隔重洋，最关紧要，务须实心经理，弹压地方，俾兵民不至滋事，番众藉以宁辑，方为妥协。令其自京

① 参见昭槁：《嘯亭杂录》卷四，《黄文襄》，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6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七七，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丙子。

③ 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26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八，乾隆十五年七月丙午。

束装，即行赴任，不必前来请训。”^①

对钱琦的处理意味着扫清了南巡的阻力，表明皇帝支持南巡的筹备，是南巡活动的最大推动力，从此，朝堂之上没人再明确反对，南巡之事得以继续筹办。

如果说《清实录》中的这些记载还比较隐讳的话，那么与伪稿案相关的一些案例则能够非常具体地证明，乾隆南巡从一开始就备受病诟。本书的探究表明，伪稿案自始至终都与乾隆南巡密切相关，或者说，伪稿追查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官方记为盛世景象的乾隆南巡，曾面对了怎样的一种官民冲突！而南巡时所谓民间欢呼雀跃，不过是一种官方文书的话语构建。

2. 第一次金川之役：劳师糜饷、毫无成就

第一次金川之役，自乾隆十二（1747）年至十四年（1749），清廷对金川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大动兵戈，用兵近十万，历时近三年，耗银近千万两。如果算上之前自乾隆十年已经开始的瞻对之役，那么在四川的这场战争实际上持续了五年之久。

瞻对之役和第一次金川之役，这是乾隆帝主动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也是他在军事上第一次碰钉子。几年内清军损兵折将，统帅张广泗、讷亲两人都先后受挫，数万清军竟然对金川土司莎罗奔无可奈何，直到皇帝重新启用名将岳钟琪，战事才有了转机。岳钟琪调整了用兵方略，使得清军开始节节胜利，莎罗奔终于在乾隆十四年初乞降，正月二十八日，岳钟琪单骑赴大金川军营招抚莎罗奔，清军第三任统帅、刚刚到前线的傅恒随即举行受降仪式，总算比较体面地结束了这场战争。

乾隆帝将这次战争的失败归咎于统兵将领、贵州总督张广泗和钦差大臣、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讷亲，并处死了这两人。

然而，这场战争更严重的后果不仅是经费消耗，也不仅是个军事上的胜败问题。持续的战争，使粮价上涨，民生渐困，给百姓带来巨大压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一，乾隆十五年八月己亥。